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关键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内生动力”

□ 刘景芝 靳娇娇

“动力”原指使机械做功的各种作用力，常常用来比喻推动工作、事业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内生动力”强调这一力量来自事物本身、由内而发。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内部，内因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多项工作中提出了增强内生动力的明确要求。深入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事业的各项要求，不断增强奋进新征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贫困地区发展要靠内生动力，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培育贫困群众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脱贫致富意识，培养贫困群众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技能，组织、引导、支持贫困群众用自己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保住绿水青山要抓源头，形成内生动力机制。202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只有人人动手、人人尽责，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才能让中华大地蓝天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



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责任，也需要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还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重塑，都离不开社会各界主体的内在认同和主动参与。

2019年7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谈到理论学习时指出，中央和国家机关任重事繁，只靠上班时集中学习是很不够的，必须强化学习自觉，增强学习内生动力，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锱积寸累，日就月将，才能水到渠成、融会贯通。我们要增强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在真学真信真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学习走形式装样子、一知半解、学用脱节等问题，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各项工作。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

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世界上因民族关系不和谐而导致国家分裂、社会动荡、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确立，民族团结的维护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转化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巨大动力。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出的重大要求，是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需要采取的重大举措。国内大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主体，对于形成内生发展动力、掌握发展主动权意义重大。近年来，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要看到，国内大循环还存在不少堵点、卡点、断点。化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难题，既要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推动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又要着力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深化改革，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等机制，还要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的卡点、脆弱点，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2023年5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雄安新区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相结合，项目和政策两手抓，通过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增强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的内生动力。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在雄安新区建设中，一方面，要积极构建有效市场，坚持市场化、开放式理念，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制度交易成本低、生活环境优、服务保障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另一方面，聚力建设有为政府，优化健全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研究出台一揽子特殊支持政策，更好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战略规划、政策制定、环境营造、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形成人心向往、要素汇聚、合力共建、共同发展的生动局面。

“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命题，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全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如何理解“社会革命”的呢？

社会革命的前提是具有“社会的历史”。恩格斯曾针对18世纪的英国状况指出：“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因此，只有英国的革命可以称得上是社会革命。在英国，利益表现为利己的、单个的利益，活动表现为独立的、个人的原子式活动，整体利益的前提是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恩格斯借英国社会的特殊性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性，他不仅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利益拥有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力量，从而确认了社会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观念，而是决定于物质利益的唯物史观。他还指出：“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中间阶级被提高到与贵族并列的地位，以及17世纪动乱之后社会关系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最早出现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实际对立，产生了社会的历史。恩格斯把英国的工人阶级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正是这种社会历史和阶级关系，为各国社会的未来提供了参照，为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方向。只要普遍的对立寓于历史之中，对立的极端发展就会产生普遍的革命，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

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恩格斯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矛盾运动的结果，又是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由此也决定了社会革命首先必须是一个整体性的革命，必须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技术、制度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层面，必然深度触及社会有机体的多重要素和多维向度，是各个革命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虽然它可能起始于其中某个单方面，但不触及社会深层要素的纯粹某一个方面的单独革命运动往往会面临着失败的可能。其次，它必须是一个历史性的革命，肩负着崇高的历史使命和艰巨的时代任务，具备不断唤醒人为人本身而奋斗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条件下解决所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群众斗争的必然结果，如果还不具备这种物质条件，即更为发达的生产力的产生和更为强烈反抗旧社会的革命群体的出现，那么，尽管社会革命的思想已经完美地论证过千百次，也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如果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一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旧的思想观念也已经成为束缚人自由发展的枷锁，那么无论旧的社会关系多么牢靠，它终究会被不可遏制的社会革命所推翻。

社会革命的真正力量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英国的工业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先声，无产阶级成为社会革命的真正力量。从数量上来看，这些人占英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第一，无产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第二，无产阶级具有坚决的革命意志，他们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第三，资本主义社会化大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无产阶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并促使无产阶级形成集体主义精神，这种组织性、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是社会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无产阶级在反

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社会革命』

□ 孙道壮

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无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这决定了无产阶级要发挥自身的强大力量，必须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由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表达了对人的解放的深切关注，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表明，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升格为普遍原则和人的社会关系的纽带，而其利益的利己性，使它不能实现普遍的自由和平等，也不能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只有当生产力得到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世界性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狭隘的个人才能成为普遍性的个人，个人才能联合起来利用人类生产的一切积极成果，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对人所生产的各种异己力量实现自主自觉的控制和驾驭，这才是社会革命的真实意义。这同时还意味着个人的解放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没有社会这一共同体，就不可能实现对异己力量的真正控制，只有在社会这一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体中，个人才可能拥有自由，社会才是个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过去出现的种种虚假的共同体，都使人不断遭受其中各种自发力量的奴役，只有当人自觉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真正组织起来，不再把社会力量以各种“虚假共同体”的形式同自身相分离的时候，才意味着社会革命的真正成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解放”也才算最终完成。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但从根本上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真正动力来源于社会发展的实践诉求，是通过社会本身的实践发展来完成的。



（上接1版头条）

“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极为艰巨的任务，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周恩来用“国大、物博、人多、任重”八个字来概括中国的特点，强调中国实现现代化将是长期的过程。1964年12月16日，他在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说，中国人口多，从需要量讲，经济还很落后，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复杂得很，“搞了十五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这是周恩来的真切感受，反映了我们党建设现代化强国既有雄心壮志，又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

（上接1版三条）

在臧懋伯看来，国君行事的出发点都应当是为了国家，而不能出于个人的享乐目的。如果国君听凭一己私欲任意胡为，就会惊扰百姓，这是“非礼”的行为，最终将导致乱政。在后一个故事中，随侯认为自己祭祀时用的牲畜毛色纯正且肥壮，盛在祭器中的粮食丰盛完备，他自信这样的行为能够取悦鬼神，使鬼神庇佑自己打败楚军。听了随侯的话，季梁却指出“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也就是说随侯的祭品丰盛不过这是人民挨饿、国君贪婪得来的，祝史谎称这是国君的功德来祭祀，这样的做法根本不足以取信鬼神。接着季梁指出：“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人民内心不依附国君，

为了稳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反复强调“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搞生产必须要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1956年2月8日，他在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时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9月16日，他在党的八大上结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强调，“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周恩来对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步骤逐渐清晰起来。1963年8月23日，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是否可以提，用二十三

警惕欲望是个人持身之法

“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作者深刻地指出安乐就好像鸩酒毒药一样，不能够贪恋，以此表明对享乐和欲望的高度警惕。“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左传》进一步指出骄傲、奢侈、淫欲、放荡四者极易腐蚀人的本性，它们是人走上邪道的内在原因，

年的时间或者是在二十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先进的社会主义强国？”9月6日，他进一步指出：三年过渡之后，我们打算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建立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在二十世纪内，建成一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64年12月21日，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强调。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不断丰富现代化的内涵，并对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完

因此在生活中应当时刻保持警醒，对自己严加要求，不可心怀侥幸、沉迷享乐。《左传》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光辉事迹，他们对自己始终持身极严、对欲望始终保持清醒认识，体现了高尚的道德人格。

《左传》记载大臣敬仲请齐桓公宴饮，齐桓公喝得非常尽兴。不久天黑了，桓公命令人点上灯继续喝，但是敬仲却辞谢说：“我只知道白天招待您，不知道晚上陪饮，不敢奉命。”《左传》特意将这段对话记录下来，表明对敬仲行为的高度赞赏，并进一步评价他“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认为敬仲只是用酒来完成款待国君的礼仪，自己并不沉迷，这是符合义的行为；不仅如此，敬仲还能够引导君主

善。党的二十大确定了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周恩来生前念兹在兹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在党和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中一步步成为现实。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节制欲望，这更是符合仁的行为。

宋国大夫子罕身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不为欲望所困的独立品格。宋国有人得到一块宝玉，想把它献给子罕，子罕不接受，献玉的人说：“我把这块玉给玉工看，玉工认为这是块宝玉，我才胆敢献给您。”面对献玉之人的恳求，子罕完全不为所动，清醒地说道：“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这是说子罕以不贪婪为宝，献玉之人以玉为宝，如果子罕接受了玉，那么两人都丧失了宝物，不如各人保有各自的宝物。子罕的言行体现了孔子“君子怀德，小人怀土”的思想，是古人以德行节制欲望的生动表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